

叶志衡
点注

中
华
传
世

庄·子

Z H U A N G Z I

经
典
阅
读

青
岛
出
版
社



庄。子

叶志衡 点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叶志衡点注.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1

(中华传世经典阅读)

ISBN 978-7-5436-4430-4

I. 庄... II. 叶... III. ①道家 ②庄子—研究

IV. 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638 号

书 名 中华传世经典阅读·庄子

点 注 叶志衡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吴清波 程兆军

特约审校 陈国先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申尧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50mm×1170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430-4

定 价 28.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80998826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引言或前言部分，文字难以辨认）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章节标题）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包含多段文字，部分文字可能为引用或注释）

前言

清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经将《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集》、《水浒传》、《西厢记》列为中国的“六才子书”，并且以《庄子》为“天下第一才子书”。《庄子》的确是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很有特色的一部书，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千百年来，《庄子》一直以其奇异诡怪、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汪洋恣肆、气势恢宏的文学表现力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至今魅力不减。学习研究《庄子》，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流变有重要意义。

一、庄子其人

因为缺少比较详细的史料，庄子的身世目前还无法有确切的说法。人们了解庄子，主要通过《庄子》一书及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的庄子姓庄名周，出生于蒙地。但是司马迁并未指明是哪个国家的“蒙”。刘向《别录》记载：“宋之蒙人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提到“庄子”时，班固自注：“名周，宋人。”由于战国时的宋地在汉代属于梁，因此有的唐代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以讹传讹，认为庄子是梁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战国的宋在汉代属梁，称庄子是宋人或梁人，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时代称谓不同而已。另外，庄子与楚国的关系似乎非常密切。《庄子·秋水》和《史记》庄子本传



都提到楚威王聘庄子一事。这说明当时的庄子在楚国影响很大,已经受到楚国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庄子思想浪漫,想象奇谲丰富,比喻奇异恣肆,具有南方文化的特点,也说明庄子与楚国联系很紧密。大致在庄子的青年时期,宋国被齐、楚、魏(即梁国)等国灭亡,其故土被齐、楚、魏等国瓜分。因此,在宋国灭亡后,说庄子是楚国或梁国人,也不无道理。

庄子的字“子休”很晚才出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曰:“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唐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中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的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开始出现。庄子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时,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

据马叙伦《庄子年表》,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学术界还有很多种说法,前后甚至相差几十年,但大多没有背离《史记》中“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的说法。总之,说庄子是战国中期人,应是不错的。

“漆园吏”是指管理漆园的小吏,庄子做这样的小官,也非主动选择,可能是为了谋生不得已而为之。面对宋国的灭亡,面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变革和矛盾,庄子深深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他选择了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退隐生活,甘与贫困厮守,一生潦倒。因此,后人喜欢将他作为隐士的先驱。庄子性格怪异,较少与人交往,惠施是与他交往相对较多的一位。庄子似乎也没有像其他诸子一样收有门徒,有一些追随者,但现存的史书几乎没有提到庄子的弟子或后学的事迹的。总之,庄子的生平事迹还是个谜。

二、《庄子》其书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庄子》有三十三篇,是经西晋郭象删订而流传下来的。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五十二篇。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也提到庄子著书五十二篇。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较为常见。魏晋时庄学渐

起,出现过多家注本。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有司马彪、孟氏、向秀、崔譔、郭象、李颐等注家。现在的郭象注三十三篇可能是在原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去留删减得来的,基本上保留了其中的精华,并吸收当时各家之注,进行自己改创性的诠释而成,注本为世所重。唐以后,其他版本渐渐失传,唯有郭象注本流传下来。李唐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先祖,特别尊崇道家及道教。因而,在唐朝注《庄》之风盛行,今可考者就有二十余种。最重要的注本是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宋代注释《庄子》的有六十多家,主要有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等。明代注《庄子》的人更多,焦竑的《庄子翼》可谓集宋明学者注《庄》之大成。重要的还有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等。清代对《庄子》的校勘训诂颇有收获,解《庄》之作有六十多家,其中以王夫之《庄子解》、宣颖《南华经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最出名。近代以来注《庄》的有五十余种。其中以王叔珉《庄子校释》、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钟泰的《庄子发微》等影响较大。

今本《庄子》三十三篇又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是郭象所划定的。但在郭象之前,就已有内外杂篇之分,但篇目与郭象不尽相同。至于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众说纷纭,主要根据是:1. 文意的深浅,文脉的贯通,行文风格的特点;2. 标题有无寓意。但内篇的选定有比较容易理解的理由。唐成玄英在《庄子注疏·序》中说:“内篇名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明于理事。内篇虽明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成玄英指出内篇的两个特点,一是“明于理本”,即理论性很强;二是“文外别立题目”,即根据文章大意另起题目概括之。内篇七篇思想较为统一,行文风格也较接近,是首尾连贯、文脉通畅的整体。

关于篇目真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郭象将五十几篇删订为三十三篇时,就有去伪存真的目的,从而删去那些“一曲之才,妄窜奇说”,不足信的部分。但先秦诸子著作由多位弟子记录先生言行或师徒共著,后学续笔发挥也很普遍。因此

《庄子》除庄子亲作之外,还包括了其追随者或后学的部分著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郭象删订《庄子》时,可能考虑到这一点。因而许多明显并非庄子本人所作的篇目或段落也收入进去,引起后人对真伪的议论。据明归有光、文震孟《南华真经评注》所引,唐韩愈就提出《盗跖》“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并认为《说剑》《渔父》二篇从思想文风看,似乎也非庄子所作。宋代苏轼提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是伪书后,影响深远。后来几乎所有认为《庄子》中有伪书的人,都同意苏轼的看法。

明代的宋濂、郑濬、朱得之、焦竑、谭元春等进一步证明外杂篇不是庄子的著作。清代的王夫之、林云铭、姚际恒、胡文英、章学诚等,近代的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马叙伦等,都分别提出外杂篇中有伪。外杂篇多伪作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

现代学者对《庄子》内外杂篇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有少数学者认为外杂篇也为庄子所作,如任继愈、刘建国、顾宝田等。刘建国的理由是:1. 杂篇中的《外物》关于龟策的说明与殷墟出土的大量龟板的记载一致。杂篇中《列御寇》“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墙而走”的记载与《左传》昭公七年的记载一致。外杂篇中的韵律皆为战国前期的韵律,外杂篇的标题多以篇首二字或人物名篇,无概括意义,都说明外杂篇早于内篇成书,是庄子早期作品。2. 外杂篇中有“封侯”、“宰相”、“仁义”、“六经”等语,并不证明是汉代作品。因为从西周到战国的《易·蛊》上九爻辞中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记载,所以秦以前已有封侯。“宰相”一词并非汉代才有,而先秦早已有之,如在《诗·小雅·二月之交》中就有“家伯维宰”,至于“仁义”对举,在庄子之前的《孟子》中就有九处之多。《墨子》一书中“仁义”对举有十九处。所以“宰相”、“仁义”之词的出现,皆不能证明外杂篇不是庄子自著。

大多数学者认为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为庄子所著。如刘笑敢在1988年出版《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认为内篇多用单纯词,外篇多用复合词,证明内篇早出而外杂篇晚出。

至于内篇篇名是根据全篇大意拟定,这种命名方式出现较晚。崔大华《庄学研究》一书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庄子》是庄子自己编定、分篇、拟名的,而且内篇的篇名不能概括整篇的内容。根据内篇篇名与汉代纬书篇名风格相似的特点,它推定整理编校《庄子》的刘向可能就是拟定了内篇篇名的人。

从内容看,内篇应当是《庄子》中的主要观点的发源地,奠定了庄子思想的基础,并且更能代表庄子那种汪洋奔放,雄辩飘逸的文风。但在缺少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确定哪些篇目是庄子本人所著,哪些是庄子后学所著。宜将整部《庄子》都看作庄子本人及其庄子学派思想和文风的体现。

三、庄子的思想

庄子尽管生活上贫困潦倒,但其思想的深刻和广博却堪称“百家之冠”。司马迁称庄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庄周显然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博览群书而又主攻老子道家思想的学者。先秦时期,老子的道家思想学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有不少学者都曾经学习过。但是庄子学习道家思想却又有新的超越。庄子应是先秦道家家派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下面分几个方面来介绍:

1. “宇宙观”和“道”论

庄子在《庚桑楚》中这样描述宇宙:“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四方上下空间而又无边无际的叫宇,有古今之长而又无始无终的叫宙。那宇宙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庄子归结为“道”。“道”被古代道家看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终极本体。老子《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认为“道”是无形无名的存在物。庄子对“道”有进一步的理解。他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有是实在可感的存在物,它不可能自己产生出万



物之“有”来，必定是产生于“无有”。老子的“无”是没有办法被感知的。而庄子的“无有”则是超越老子的“无”的一种更高境界。这是一种自我的空无。这种空无就是庄子的“道”。庄子在《知北游》中说所谓的“道”是“无所不在”的，甚至道“在蝼蚁”，“在瓦甓”，“在屎溺”。宇宙中的一切都有道，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道。“道通为一”。内篇《大宗师》说，狝韦氏、伏羲氏、维斗、终古、日月、堪坏、冯夷、肩吾、黄帝、颛顼、禺强等等，他们得道之后都产生了变化，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万物得道，道亦作用于万物。道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庄子还认为，要合乎“道”，就要顺应自然。庄子所说的“自然”，指事物非人为的天然状态。要达到这一状态，就要丢弃人为的智术、谋略、德行、巧饰、功利，做到无为无我，超越生死，超越束缚，才有利于人本性的发展。

2. 齐物论和相对主义

老子认识到矛盾双方是对立的，并且相互依存。“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同时，还指出矛盾双方遵循“物极必反”的法则，可以相互转化。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庄子受到老子这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只有相对，没有绝对。“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大”与“小”、“寿”与“夭”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此”就没有“彼”；“彼”可能成为“此”，“此”也可能成为“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总而言之，庄子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等等各个领域的认识与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

性。“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庄子把是非想象成一个大圆环，体道之人齐是非，于是站在环的圆心点上，不偏不倚，是非齐一。

庄子还认为人类的贵贱观念也是相对的。由于受时代变化的影响，过去以为是尊贵的东西，今天就可能变成低贱的东西。反之，过去被人们看作低贱的东西，今天又尊贵起来。

是与非，真理与谬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是非随人而变，随人们的成见和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客观的标准。比如儒墨两家，就是以自己为是而以对方为非，无法判断。再比如“鳅……麋鹿……毛嫱，丽姬……”究竟谁是谁非呢？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庄子甚至齐生死，“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人的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事，正如昼夜的变化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而“庄周梦蝶”的故事，则说明人们只要站在不同对象的角度上看问题，生死就是一个谁也解释不清楚的问题。

总之，“是”与“非”、“贵”与“贱”、“荣”与“辱”、“大”与“小”、“成”与“毁”、“寿”与“夭”、“生”与“死”等等都是相对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观点过分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否定了万物的个体差异，使其认识论陷入了不确定的混乱之中。这是有失偏颇的。

3. 虚无无为，消极避世

老子就已主张“无为”，但其目的却在于“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无为学说，但庄子的“无为”却不以治世为目的。他遨游于自我的天空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面对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索性关闭起来，坐在无人的旷野中，体会大自然的亲情。任何的礼义道德在他那里都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说这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反动。然而这也是反抗现实的无奈之举。战国时期，争名夺利，礼义虚伪，价值标准紊乱不定，仁义法度根本无法解决社会中的问题。《骈拇》

《马蹄》《胠箧》《盗跖》《渔父》中,就有痛斥儒家“仁义”的议论。人世间多有假造仁义或利用仁义沽名钓誉的人,搅乱了本来的平静。一些人为了获取名利,偏离正道而去追逐变质的仁义,终其一生而不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戴着仁义的面具,社会真正需要的道德却渐渐被疏远和抛弃。

庄子反对仁义道德破坏人类的天性,认为儒家学说不能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那么,庄子怎么样来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在《庄子·秋水》一文中,庄子借北海若之口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寥寥数语,指出人为对天然的摧残,希冀我们能谨守天真的本性,不要置万物于不顾,最终成为灭亡整个生物家园的罪魁。这些话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们不能去违背。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情绪、欲望,避免做出那些损害自然的极端行为。否则的话,人类自己会惹出大麻烦。

庄子对当时的社会也看得很深刻。战国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战争把人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各国国君利用封建等级制度,通过一系列的道德法度、政治手段来控制百姓。对此,在《庄子·应帝王》中就有严肃的批判:“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鸩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在庄子眼中,“经式义度”不过是统治者用来“欺德”的工具,连飞鸟、鸩鼠这样的弱小动物都有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本能。难道比他们更聪明的百姓会轻易被欺骗和统治吗?这犹如“涉海凿河”、“使蚊负山”一样,根本办不到。若强行以“经式义度”愚弄百姓,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因此,庄子提出废弃君臣之分,返朴归真的思想,并勾画出一个无等级、无君臣的理想社会。“夫至



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庄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和禽兽在一起，不用智巧，毫无欲望，朴实无华，保持人的本真。但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难道就是最值得人类向往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不说这一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低落到什么程度，单是从物种的演化而言，人类的产生就是孜孜追求、逐渐学习的结果。庄子的观点否定了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文明成果，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这是我们认识庄子无为思想时应该考虑到的。

庄子不仅对乱世有着冷静的批判，而且不遗余力地为当时的士人寻找避祸全身的道路。《庄子·大宗师》篇中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也就是说，一个人忘掉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一切外在事物，离开了形体和智慧，做到了物我两忘，这就是“坐忘”。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庄子借孔子与颜回之间的故事又提出所谓“虚者，心斋也”的修养方法。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做到了“坐忘”与“心斋”，那么他的精神就能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限制，就可以排除人世间的干扰，保持心理的虚静平和，进入了一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境界。庄子正是希望通过自我的内在精神上的“坐忘”与“心斋”，达到一种任自然而虚空，一切不入于心的状态，这是庄子思想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乐天知命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但是，其明哲保身、消极避世的思想也流毒深矣！

四、《庄子》的文学艺术

除了独特诡异、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外，《庄子》一书同样是以其汪洋恣肆、气势恢宏的文学表现力为后世文人所叹服。《庄子》一书达到了哲理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在先秦说理散文中，它无疑最具有文学价值。鲁迅所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下面也分几点来介绍：

1. 奇幻的浪漫主义

《楚辞》被公认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源头,《庄子》同样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资源。比如说“大”:内篇《逍遥游》中的鲲鹏,大到几千里,水击三千里,扶摇能上九万里。外篇《外物》中任公子垂钓,要大钩巨缗,以五十头牛为饵,蹲于会稽山上,投竿东海,一年过去,大鱼吞饵,顿时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声如惊雷。钓上来的鱼之大,可令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均得饱食。如言“小”之奇:杂篇《则阳》中说:“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这是雄奇的夸张。在儒学盛行、侧重理性的中国古代,能有如此想像的文人是屈指可数的。再如描写仙人的形德之美。《逍遥游》篇中藐姑射仙人的美:“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还有描写丑之极的。内篇《德充符》中阉跂支离无脤,双脚拳曲,驼背。“甕瓮大瘿”,脖子上长着瓦瓮那样大的肿瘤。《大宗师》中的子舆,“曲僂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意思是腰弯背驼、背骨凸露,脊背朝上,下巴隐藏在肚脐里,肩膀高过了头顶,颈椎弯曲朝天,真可谓奇思妙想。

不仅是人物形象,甚至连自然界的事物也被拟人成为寓言故事的主角。如《庄子·至乐》中记叙了死人的头骨与庄子同寝,梦中髑髅与庄子对话讨论死生之间的际遇。庄子通过髑髅对死生发表的看法,表达其死生齐一的观点,真是大胆奇绝。此外,庄子还创作了一系列看似虚无缥缈却又合情合理的形象。这些形象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界,呈现出宏伟壮阔的气势与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

2. “三言”的运用

“三言”是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重言、卮言,其中寓言是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庄子》中所指的寓言和我们现在说的寓言是有区别的。《庄子》中所指的寓言,按庄子的说法是“藉外论之”,即借别人的言论才能取信于人。《庄子》一书大

量运用寓言,有的通篇就是一篇寓言,如《渔父》。有的十多则寓言构成一篇,如《则阳》。《庄子》全书大小寓言共计二百多个,可见寓言在书中的分量。寓言的运用,能使深刻的道理寓于浅显的故事之中,通俗易懂,意味悠长,增强了说服力。而且在寓言中塑造了众多形象,使人耳目一新,诸如鲲鹏、鸢鸠、藐姑射仙人、栢树神、子舆、渔父、儒生等。如《外物》说:“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其中对虚伪儒生的讽刺,是多么辛辣幽默。诗礼本是儒家教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是儒家进行宣传感化的主要载体,而盗墓是天下最肮脏的勾当。一个是极神圣的,一个是极龌龊的,用儒家经典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两种极不和谐极其对立的东西,在寓言中的儒生身上却赫然并存,对儒生形象的讽刺达到极强的效果,令人哑然失笑。“重言”则是借重古代圣贤或当时名人的话来表达己意,驳难天下辩士。其实,这也是“藉外而论之”,只不过,这“外”不是一般的他人他物,而是“重”者,如老子这样的名人、古代的圣王,有时孔子也包括在内。用这种方式,可以加重世人的认同感。“卮言”是表明他自己所说的话如酒器中的酒,“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都是率性随意、有口无心之言。“三言”都具有虚构寄寓的特点,故统称“寓言”。庄子的寓言,想象奇特,视角新颖,色彩瑰丽,形象诡异,情节生动,思想玄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3. 充沛的激情、宏伟的气势

庄子的散文已经跳出了先秦语录体的束缚,其文学性超越了哲理性。论理时的滔滔之势不可抵挡,扑面而来。如外篇《刻意》开篇列举社会上备受关注的五种类型的人及其行为:“山谷之士”的高谈时政;“平世之士”的恭俭诲人;“朝廷之士”的治国立业;“江海之士”的隐逸休闲;“道引之士”的健体求寿。接着又用四个“故曰”描写得道之人“恬憺、寂寞,虚无无为”产生的效用,以及影响心性的诸多因素。文章一

泻而下,势如破竹。又如《盗跖》篇写盗跖论辩时所说:“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之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用排比句一连举了六个人的例子,颇具雄辩色彩。再如内篇《逍遥游》中忽而鲲鹏斥鴳,忽而藐姑射之神人,忽而五石大瓠,忽而不龟手之药方,天上人间,人道仙灵,左右逢源,操纵自如,任其驱用。诚如一江春水,滚滚而来,气势磅礴而又闪亮晶莹,飞溅起朵朵浪花,充满灵气和韵味,让人叹为观止。

4. 善用比喻,生动形象

《庄子》一书中大量运用比喻,明喻、暗喻、借喻、连类比喻都经常一连串地出现在文章中,达到了形神俱佳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庄子》一书的文学品位。其实,寓言、重言、卮言“三言”也都含有比喻意义。在外篇《天运》中用大量的比喻来描摹音乐的形象,来表现修道经历的过程:“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愤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开始惊恐,然后放松,最后迷惑。作者用音乐的忽盛忽衰,忽上忽下,忽起忽消,忽高忽低,变化万千来比喻修道初始的无法预料,使人恐惧,非常形象。作者又写道:“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阮满阮;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里写出了音乐的短促而又悠长,柔弱而又刚强,变化而有条理,临山则满山,降坑则盈坑,高似上天明如日月。用来比喻修道的第二阶段,即开始进入明晰放松阶段。接着写道:“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这里的音乐

乍起乍消,如结果,如开花,像行云流水,像雨飘风动,想倾听而无法捉摸到它。用来比喻修道的最后阶段,即进入大智若愚,复归糊涂迷惑的阶段。像这样生动、巧妙的比喻在《庄子》一书中有很多。它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论辩的说服力,也增强了《庄子》一书的趣味性、可读性。

5. 词汇丰富,表现力强

《庄子》一书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所创造的许多新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的美感。如《齐物论》中对天籁之音,地籁之音,人籁之音的描写,特别是他解释“地籁之音”时写道:“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些形容词都是庄子首创。庄子好用寓言、重言、卮言“三言”来说理论证,为后世留下了150多则寓言、两百多个成语典故。它们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和文章中,成为一份宝贵的遗产。如:变化无常(《天下》)、大有径庭(《逍遥游》)、绰约多姿(《逍遥游》)、游刃有余(《养生主》)、踌躇满志(《养生主》)、呆若木鸡(《达生》)、昭然若揭(《达生》)、得心应手(《天道》)、东施效颦(《天运》)、分庭抗礼(《渔父》)、吐故纳新(《刻意》)、井底之蛙(《秋水》)、望洋兴叹(《秋水》)、贻笑大方(《秋水》)、相濡以沫(《大宗师》)、每况愈下(《知北游》)、白驹过隙(《知北游》)、化腐朽为神奇(《知北游》)等等,不一而足。《庄子》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语言词汇宝库。

五、庄子的影响

“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确实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它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章家。”(郭沫若《鲁迅与庄子》)庄子的思想和《庄子》的文学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儒家思想偏重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层